

一、历史文化



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 和睦相处经验考察*

班班多杰

在当今世界，大量事实表明，民族问题可以成为影响国内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如何和睦相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深厚的理论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借鉴。“和而不同”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意谓君子应该做到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即既承认事物的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形成平衡、和谐的状态。费孝通先生曾十分睿智地把“和而不同”的理念引入民族关系之中，提出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①。冯友兰先生用“和而不同”的哲理回顾与展望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归宿：“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

* 本研究是笔者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课题“藏传佛教与藏民族之关系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的阶段成果。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曾得到原黄南州州志办主任才让先生，原河南县县志办主任假真先生，河南县档案局局长、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先生的指导，本文初稿承三位匿名专家审阅，修改稿吸引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文已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此次又做了一定修改，特此说明。

① 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①他还憧憬各民族历史文化是：“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道不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

“和而不同”的理论内涵已经有许多哲学家进行了阐发，只是鲜见有人从经验的层次，基于对多民族文化相处实践的考察及对其内涵的讨论。本文拟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我们将人类学、哲学的文化透镜投射到青海。

青海具有独特的地理人文特色。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藏、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历史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西域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②，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的亲缘关系，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因缘和合”“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

笔者拟以青海各民族互相依存，取长补短，互利互惠，文化上互相采借、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讨论多民族文化相处“和而不同”的具体内涵，以期对于破解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如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难题有所贡献。

一、研究方法

（一）考察的五个维度

青海多民族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在民族杂居的情况下，发生了范围广泛的文化涵化。为了考察各民族汲取他民族文化因子的现象，以及在

①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② 文化涵化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持续性地、直接地接触、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者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异。

民族心理上引起的变化，应当从哪些维度来进行考察呢？我们知道，民族“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据此，根据青海多民族文化涵化的特点，我们确定，民族文化及附着其上的对本民族族籍的认同应当是考察的重点。^②那么，民族文化中又需要将哪些作为考察重点呢？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E.B. 泰勒对文化所下的经典性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基于泰勒的定义，结合青海民族文化互相吸纳采借的具体情况，本文拟着重用五个维度来分析各民族文化涵化的状况。这五个维度是：(1) 语言；(2) 宗教；(3) 婚姻；(4) 生活样式；(5) 族籍认同。这就构成了我们考察的五个维度。

(二) 拟采用文献法和个案法进行研究

本文旨在考察青海多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互相采借及其引起的民族文化变化的状况。因而，一方面要查阅有关文献，另一方面需要做实地调查。

根据本文的目标，我们选取青海六个文化采借较为突出的个案进行调查。这六个个案是：海东地区循化县道韩藏族乡宁巴村的汉族藏化；向藏文化涵化的两个个案：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四个乡的蒙古族，黄南州同仁县上、下五屯村的土族；向汉文化涵化的两个个案：海东地区乐都县卓仓的藏族，西宁市湟中县塔尔寺周围拦隆口镇白崖村和上新庄镇上、下村的藏族；海东地区化隆县卡力岗地方藏回的伊斯兰化。这里的“藏文化涵化”“汉文化涵化”，系指某族借取他文化的诸多因素，但并未融入那个出借文化元素的民族，而仍保有本民族的重要特点。

2006年7—10月，课题组成员在这六个地点进行了实地调查，下面先分述这六个个案的基本情况，然后做进一步的讨论。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② 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内容，学术界曾有过许多讨论。现在已经形成了族籍认同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重要部分的共识。

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理论与实践

二、调查结果之一：六个个案

（一）藏化了的汉族：道帷宁巴模式^①

青海汉族藏化的情况很多，但藏化的深浅程度不一。在汉藏杂居的河湟地区^②，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在藏族聚居区生活了两代三代的基本上都被藏化了的汉人家庭。

我们选择了青海省循化县道帷藏族乡宁巴村的汉族藏化进行个案考察。道帷藏族乡的主体民族是藏族，占全乡人口的80%以上，近15%是汉族。在藏族文化的长期熏染下，这部分汉族从信仰观念、文化态度、思想倾向、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基本藏化。宁巴村是藏汉两族混居的自然村。全村现有180多户，1000余人，其中藏族169户，940人，占全村人口的90%，是该村的原住民。汉族11户，60人，占全村人口的10%。村内有一座格鲁派寺院和一座嘛呢康，村民全部信仰藏传佛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巴村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之后逐步弃牧从农。

宁巴村的汉族是20世纪40年代从甘肃临夏地区来此谋生的一名木匠和一名货郎的后代。起初，这位木匠在道帷地区主要干建筑中的木匠活，宁巴村的房屋基本都由他来修建，之后全家便从临夏迁来，承包经营了村里的一座水磨坊。货郎经常穿梭在道帷与临夏之间做一些小买卖，久而久之，也带来家属承包了宁巴村的另一座水磨坊。从此这两个汉族家庭在宁巴村落户定居。但是，正式加入到宁巴村是在人民公社成立之时，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的政策使这两个汉族家庭也分到了土地。

宁巴藏化汉族的突出特点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是自觉、主

① 该个案为课题组成员、我校藏学院宁巴籍藏族硕士研究生李果同学2006年8月所做。

② “河湟地区”包括现今青海省西宁市为中心的海东地区、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回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费孝通称河湟之地是“中原同青藏高原的流通孔道”。

动融入藏族的。^① 他们皈依藏传佛教，和藏族群众一样按照藏族的规则和惯例行事，讲藏语，娶藏族媳妇，并且按照藏族的习俗举行婚礼，让孩子取藏族名字，习藏语文，家庭成员以藏族习惯互相称呼。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可选择涵化”的实例。这样的涵化模式往往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接触来实现的，所以去汉化的进程很快，只经过两代人，至孙辈，已经不会讲汉话了。这些汉族们的生活样式与藏族无异，已经基本上藏化。他们自己认为是藏化了的汉族，当地藏族群众也认为他们已经是藏化了。有意思的是，部分汉族家庭将孩子送到藏文学校里学习藏语文，有一部分还考入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藏语文专业，毕业后从事藏语文教学工作。这些都说明他们认同藏族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把藏族的规则内化的过程。

不过，在重要的人生礼仪上，他们还是保留了汉文化的因子。例如，保持汉族传统土葬的习俗，认为尸体火化或天葬是对死者的不敬。还有春节家门上贴春联、门神，清明节祭祀祖先等。

文化涵化是双向的。在河湟地区乃至与其临近的半农半牧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诸多文化元素。这些藏人一般都会讲当地的汉语方言，有些还通晓汉文，很多人都取汉名，过汉族的节日，很难认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在这些地区，不管是汉族、藏族或其他民族，他们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还是很清楚的。这些事例说明，在汉藏民族的融合中，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可以互渗，但族籍认同是一个硬核，无法穿透，难以改变。

（二）向藏文化涵化的两个个案^②

1. 河南蒙旗模式：蒙古族的藏文化涵化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青海南部，北临本州泽库县，南依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靠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处在藏族文化的包围圈中。据 2000 年的统计，该县蒙古族人口占

① 一位被访者说，其父为使他们“能在藏族占多数的宁巴村立足，不但为我起了藏族名，而且还为我娶了藏族媳妇”。

② 这两个个案的调查由作者与课题组成员、青海民族学院教授索端智博士完成。

全县总人口的 89.55%，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这里的蒙古族是不同蒙古部落、不同年代迁入的。其祖先主要是厄鲁特部中的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和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中的达吾尔部与火落赤部的蒙古人。^① 其中最早进入的时间在 13 世纪南宋时期。由于处在藏族文化的氛围之中，经过长期与藏民族的交流、融合，他们从信仰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已向藏文化深度涵化。他们讲一口优美、标准的安多牧区藏语^②，并且皈依藏传佛教。数百年来，他们在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而不远徙。

虽然河南县蒙古族在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上与藏族已经高度重合，甚至合二为一了，但在族籍认同上却呈现出差别不一的情况：

第一，群众蒙藏两可，干部认同蒙古族。

我们到河南县实地考察，走访了全县四个乡的蒙古族牧民、干部、学生以及一部分文化人，还与长期在河南县工作的汉族和藏族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度访谈。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是，广大牧民群众对自己族属的自我认识相当模糊和暧昧。当问到“你们是什么民族”时，绝大部分都回答“我们是牧民”。只有少部分有点儿文化的人会回答“我们是藏族”，有些回答“我们可能也是蒙古族”。

① 据历史记载，河南县蒙古族是不同时期从三路进驻黄河南部西倾山脚下的。早在 1257 年（南宋宝祐五年）蒙古军进攻南宋时，就在今甘肃省玛曲县、四川省诺尔盖县以及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地区设立驿站（阿依伯站和术赤站）和马场，以保证其交通军需后方安全。后来，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最早进驻河南蒙旗的蒙古族居民。1588 年（万历十六年），漠南蒙古部落首领火落赤由环湖地区率部进驻捏贡川（今同仁县、泽库县一带）地区成为第二次进驻河南地区的蒙古族居民。1636 年（明崇祯九年）秋末，应格鲁派之约，顾实汗率部万余人进军青海，并将部众移牧于青海草原。河南县的主体是厄鲁特蒙古，他们是公元 1652 年（顺治九年）率部进入河曲地区的。参见才让编著：《青海蒙古世系史》，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1 页。

② 河南县的一位蒙古族干部向我们开玩笑说，“百分之百的蒙古人讲百分之百的藏语，百分之百的蒙古人百分之百地不会讲蒙古语。这就是我们河南县蒙古人的现状。”

但一些基层干部蒙古族的情感非常浓厚。一个牧委会的队长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周围全部都是藏族，我们蒙古族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住，目前我们需要有一个为我们做主的人。听说内蒙那边非常发达，能否从那个地方派一些能为我们做主的蒙古人来？”看来他们有明确的族籍认同感和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到宁木特乡看到乡政府附近一家饭馆的墙壁上挂着成吉思汗像，问后得知，饭馆的老板原是本县的职工，近来停薪留职开饭馆。他说：“挂成吉思汗的像，就证明我们是蒙古族。”以此标签来表征自己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身份。

第二，在多数干部、教师那里，对于藏族的认同感也很强，只是其程度不及对于蒙古族的认同而已。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干部的以下看法在当地干部和教师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虽然彻底地藏化了，但在我们的血统里流淌的是蒙古族的血，骨髓也是蒙古族的。如果一个蒙古族人和藏族人打架，旁边的蒙古族肯定会帮蒙古族；如果藏族和别的民族打架，他肯定会帮藏族。”流露出蒙古族原生性和根基性的情感。但是，在访谈现场，另一位干部却有不同意见：“谁有理我站在谁那边。”一位蒙古族学者对我们说：“当别人骂藏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高兴，骂蒙古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同样不高兴。藏族的心态和蒙古族的心态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各占一半。”还有一位在藏族聚居区工作的河南县蒙古族学者和我们交谈时，他说：“在河南县的民族认同问题上，首要的是看文化认同，血缘认同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看重这个东西。”

另外，他们也保存有大量蒙古族的文化特色：

(1) 生活样式：保存大量蒙古族特点。他们住的帐篷大部分都是白蒙古包，蒙古包上的很多构件至今还保留着蒙古语的称谓^①，在大蒙古包的旁边有小的藏族牦牛帐篷，这一习俗延续数百年而不替。另外，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赛龙乡的蒙古族人所操的藏语中还夹杂着蒙古语的词汇。有些老人现在还会说蒙古语。

^① 例如，蒙古包上的天窗叫“哈拉其”，蒙古包内的穿杆叫“吾你”，围栏叫“特尔姆”，门扇叫“格尔果”，门闩叫“共”，蒙古包里的围栏布叫“扣系格”，围栏固定绳叫“卡布金”，木桶叫“苏木”，内围栅绳叫“斯得哈”，这里的有些名称可能是藏语，例如“苏木”后来被青海蒙古族借用。

在服饰上，河南蒙古族妇女仍然保留着传统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他们采用蒙古族传统的方法缝制皮袄，这种皮袄至今享有盛誉，是河南蒙古人的品牌产品。

在风俗上，河南蒙古人至今保留的蒙古族习俗有：家庭中如果生了男孩儿，满月举行庆典，三年后要举行剃发仪式，结婚时要举行大型的婚庆。而这里的那达慕大会则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从内蒙移植过来的。不过，地道的蒙古族那达慕，会场的解说词却全部使用藏语，这说明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可以同时认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群体。又如青海海晏县哈勒景蒙古族乡，平均海拔 3200 米，是一个纯牧业乡。辖三个行政村，共有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土族五个民族，有农户 382 户，1677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4%。我们采访了哈勒景乡人拉毛扎西家，他是这家的主人，系男士、蒙古族、小学学历，1961 年 12 月出生，现年 53 岁，是“那达慕”和“蒙古包”传承人。家中共有 7 人。妻子哇里玛，又名马秀清，回族，现年 51 岁。儿子仁青多日杰，蒙古族，现年 31 岁。儿媳郭青中，汉族，现年 31 岁。孙子蒙克巴特现年 10 岁，现就读于祁连山小学，孙女雯彩卓玛现年 3 岁。小女代世青木措，蒙古族，现年 25 岁。女婿，藏族。这个家庭由蒙古族、回族、汉族、藏族四大民族组成，家中有佛堂。当问到他家庭的基本情况时，老两口共同回答说：从宗教上讲，全家都信藏传佛教。当我们问妻子哇里玛：“你作为回族也信藏传佛教吗？”她没有明确地回答。拉毛扎西解释说：“在信仰上我们尊重她的习惯，在生活上，我们多数服从少数，全家都吃牛羊肉而不吃猪肉。”当全家都集中起来的时候，都用汉语来交流，有时也说蒙语，藏话也懂一些。这是个典型的多民族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家庭。^①

① 2014 年 7 月 21 号下午，我们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勒景乡采访了这个家庭。在海北州，不仅很多家庭这样，从社区乃至乡镇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如祁连山县的默勒镇是一个蒙古族、藏族、回族、土族、汉族、保安族等民族聚居的乡镇；八宝镇以回族为主，由汉族、藏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处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状态，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

(2) 民族意识：蒙语教学的推行与困境。长期以来，河南县的蒙古族和藏族一样，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实行的是以藏文为主、汉文为辅的双语教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蒙古族族籍认同的不断强化，河南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县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在有一些蒙语基础的柯生乡和赛龙乡的小学将蒙语文作为主课学习。后来在县民族中学也相应地设置了以蒙语文为主课的班次。经过近十年的学习，培养了一批懂得蒙语文的初、高中毕业生，有些毕业生还考上了青海民院、内蒙师大的蒙文系，但是这些学生学成回乡，所学之蒙语文无用武之地，后来也就纷纷改行。于是，1996 年的县人代会又决定恢复以藏文为主课、汉文为辅课的做法，不过可以兼学蒙文。^①

这是一个在藏文化取向上高度涵化而仍保留蒙古族族籍认同的类型。

2. 上、下五屯：土族的藏文化涵化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上、下五屯社区的土族人以虔信藏传佛教和绘制藏传佛教唐卡、雕塑佛像而闻名于世。“五屯艺术”是藏族佛教艺术的著名品牌，五屯已成为藏文化之乡。

在民族认同上，五屯人呈现出有趣的藏族取向。五屯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全部被确定为土族；考诸文献，他们原是汉族移民，也有蒙古族的成分^②；但他们自认为是藏族。

关于族籍认同为藏族，有如下情况：(1) 在他们的口传史中说，其

① 一位河南县的蒙古族作家对我们说：“我们都有蒙古族的民族情结，但民族感情不能当饭吃，重要的还在于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对我们民族负责的态度。”

② 据汉文史料记载，五屯人是由内地拔往隆务河流域屯田的汉族移民，清《循化志》卷 4《族寨工屯》记载：“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拔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为目之番民矣”。（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3 页）观其会通，探其流变，溯流探源，理其嬗变的结果是，五屯族群的主体大部分是内地拔往隆务河流域屯田的汉族移民，而其他三屯居民则和蒙古军队有关。五屯至今仍有侯、包、梁、杨、康、穆、刘、马等姓氏。吾屯语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受藏语强烈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约占 63%）吸收藏语（约占 37%）后形成的汉藏语混合结构式方言。语言上完全有别于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的语言，上述三庄是蒙古语的分支。

祖先来自藏族，传说他们是在吐蕃王朝时期从吐蕃的雅隆河谷被派遣到同仁地区戍边的吐蕃人；(2) 选择性族籍认同：认为是藏族有好处。^①这是基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而作出的一种选项。现在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在身份证等登记表格上填的仍然是土族，因为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识别时经过国家的行政性和制度性的认可而确定下来的，无法改变，但后来出生的许多五屯村民在确定族别时选择了藏族；(3) 心理基础：他们长期处于藏族和藏族文化的环境中，几乎全盘接受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这构成了他们认同藏族族籍的心理基础。这几点说明在一定的通时性的场景下，族群认同是可以选择的，它更多的是人们对文化、宗教、习俗、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认同。

民族识别的工作中之所以将五屯村村民统一确定为土族，其根据是：(1)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2) 上、下五屯的妇女仍然穿土族服装。^②这两点是最具土族文化特征的符号，在当时是确定他们为土族的主要原因之一。

“族群认同中的工具论者认为……本质上，族籍和传统不过是人们为获取经济、政治利益而操弄的一种工具而已。”^③此说虽稍失偏颇，但也是族群认同状况论的一种认识。上、下五屯土族是同仁土族的代表。他们对自己族籍的藏族认同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基于主观因素的流动性的状况依存理论。

综上所述，在族群的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上，河南蒙旗人选择的是前者，五屯人选择的是后者。这两种模式，也正好符合我们提出的五个维度的分析架构。

① 我们采访下五屯寺管会一位成员时，笔者问他：“国家早就把你们确定为土族了，你们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服装，为什么现在偏要当藏族？”他说：“当土族有什么好？当藏族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② 不过，这种土族服装和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服装有很大的不同，青年妇女一般穿红色的宽裤腿裤子，中老年妇女则穿蓝色的上衣和裤子，上衣两边开口。

③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2 页。

（三）藏族汉文化涵化的两个个案

1. 卓仓模式^①：设界而不关门

卓仓藏族自明代在河湟地区生息以来，就与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四个民族相邻、杂居，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汉语、汉文，吸纳汉族的风俗习惯。卓仓所在的乐都县处于河湟地区，这里是青海藏族中吸收汉文化最方便，也是最多的部分。卓仓藏族人的汉语文水平、汉文化素养在青海藏族乃至全国藏族聚居区中属水平很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这里还有人学习四书五经，汉地广为人知的有关薛仁贵和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在这里流传。另外，他们从汉族主流文化中采借诸多元素的同时，又始终保持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即他们主要还在运用本族群的文化元素。卓仓藏族还是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中藏语及藏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得较为完整的地区。

（1）语言：大量吸取汉语成分。卓仓藏族自古至今都操藏语，但在藏语中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汇。卓仓藏族说十句藏语就会夹杂着三四个汉语词汇，有些藏语中的关键词都是汉语词汇。例如说“我儿子在北京读书”，用卓仓藏语表达就是：“拿吾擦‘北京’哪‘书’端果洛热”；此外，这里的语法、语音也受到汉语一定的影响，形成了安多藏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次方言。

（2）取汉姓。卓仓地区的藏族普遍都取了汉姓。初步统计，卓仓藏族中的汉姓有：梅、苏、相、白、李、鲍、祁、钱等 50 个左右，但名字是藏名，如范嘉央、李才旦。汉姓与藏名达到了相得益彰、水乳交融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们仍保留有自己的藏族姓氏。^② 与外界交往时用汉姓，在自己内部用藏族姓氏，形成了藏汉双轨的姓名制。

（3）学习汉族的生活技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上的汉文化在生活技术上有精致的优势。卓仓藏族还向汉族学习了裁缝、绣花、做鞋等工艺技术。另外，在开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卓仓藏族又坚守自己藏文

① 这一个案由课题组成员卓仓籍人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扎洛博士于 2006 年 9 月完成。

② 参见尕让·杭秀东珠、尕让·尚马杰：《卓仓藏族源流考》，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4 页。

化的根基：

第一，坚持使用藏语文。第二，全民信仰藏传佛教，遵从手持念珠，烧香拜佛等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第三，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传统价值观。他们身穿皮袄，女士佩戴加郎，吃酥油糌粑，饲牛羊六畜。在民族精神方面，坚守勇敢豪放，忠厚持重，勤恳劳作，饿不行乞，穷不为盗，富不欺穷，尚武功，以病死为耻，以战死为荣的价值观。^① 第四，极为重视藏族血统的纯正，他们说：“人穷总有翻身时，骨头坏了黄河水也洗不净。”因此，坚持族群内通婚。所谓内婚制也就是血缘骨系制，即凡是卓仓七条沟里的藏族人都必须在这七条沟的藏族人中选择配偶，因为这七条沟里的藏族是他们能够明确作出判断的血统纯正的藏族人，而其他地区藏族的血统是否纯正无法判断，所以不愿与七条沟外的藏族结亲。

现在，这一规范的观念对其群体成员还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并用以指导、支配他们的婚姻行为。这一地区外出读书、当国家干部的人很多。他们的配偶几乎都是从自己的家乡按照优、中、劣的骨系来选择的。即便没有依家乡骨系找配偶，也必须在藏族中找。否则，父母会干涉。

卓仓藏族一方面对于异文化取十分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恪守本民族的核心文化，持一种设界而不关门的态度。

2. “家西番”模式^②：藏族汉文化的深度涵化

“家西番”是对塔尔寺周边各社区乃至河湟地区居住的已经被汉文化深度涵化的藏族的指称，意谓非藏非汉、在家的藏族等。据《新青海·乡土志》第2卷第11期记载：“申中十三族中，除群加族及贾尔藏、琐尔加有部分未汉化的藏民外，全部融化为汉民。”申中十三族是塔尔寺六部落。这些所谓融化为汉民的藏民，即是“家西番”。比之卓仓藏族，“家西番”汉化程度更深。“家西番”历史上是宗喀藏族，元末明初，他们基本属游牧民族，“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明中叶以后，实

① 参见尕让·杭秀东珠、尕让·尚马杰：《卓仓藏族源流考》，第144页。

② 该个案为课题组成员湟中塔尔寺籍人氏、青海民族学院先巴教授所做。

行“移民实边”政策，大批汉人移居河湟，或戍守或屯种，与当地番夷错居。其生产方式逐渐转变，据《西宁府新志》：申中族、西纳族“有城池郭庐室，田畜为业”。经过数百年的接触、交流，至清朝中期，其生产方式实现了由游牧向农耕的转轨，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

汉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带来了农耕生产，还使这一地区的文化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汉文化最终成了一大部分宗喀藏人世俗文化的主流。他们最后被称为“家西番”，在饮食、建筑、服饰等族群边界的外显特征方面基本上已经汉化了；在语言上，则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母语——藏语文，汉语文既是家庭用语，又是社交用语，取名也基本上为汉名；在婚姻上，族内婚的边界已经松动，开始允许与外族通婚。这也许就是塔尔寺周围的原生态藏族变成家西番的根本原因。卓仓和家西番人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民族内婚和族际通婚是维持族籍稳定和导致族籍变化的重要变量”^①。但其族籍认同为藏族，仍然信奉藏传佛教，只是其藏族的意识和信仰的程度不那么强烈。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家西番人出现了某种“返祖”现象。2006年七八月间，课题组成员在对塔尔寺周围拦隆口镇白崖村和上新庄镇上、下村的调查中发现，除了少数年老者，这几个村的绝大多数藏族村民已经不会说藏语，但都有藏语名字。同时，那些标志藏族特点的婚俗、服装、语言、姓名、建筑等外部的文化特征，以及其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都开始向藏文化回归。他们开始穿藏族服装，过藏族节日，逢年过节到藏传佛教寺院烧香拜佛等。很多社区恢复了消失多年的跳藏族舞蹈的习惯。如近年来相继在上新庄镇、共和镇、丹麻乡琐尔加村等建立了五个舞蹈队，过年过节，他们穿着藏装、唱着藏族现代歌曲，为各个社区的群众跳舞。共和镇近几年来还恢复了骑马比赛。这体现了在世界经济文化的大潮下，家西番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还在塔尔寺六部落中汉化程度最高的拦隆口镇考察时发现，人们在通常的语境中仍然会出现“某人为藏族”“某人为汉族”的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求同与辨异现象。这说明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已确立了稳定的族群边界与族群身份。这种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的现象，在青海湟中等的民族文化关系中呈现为“倒塔式”形状。从西宁到塔尔寺以北的藏族，如多巴、拦隆口等乡镇，其人名、服饰、婚嫁、语言等习俗完全汉化，但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藏族，与汉族不同”的心理边界虽不明晰，但仍然存在。塔尔寺以南，帐房台、家尔藏等拉脊山以内的藏族，其人名，服饰、语言、婚嫁等习俗已是藏汉杂伴，语言以汉语为主，兼通藏语，“我是藏族”的心理边界很明晰。拉脊山以外的藏族，如群加藏族乡是藏汉杂居，其人名、服饰、语言、婚嫁等习俗保持着完整的藏族面貌及特征。语言以藏语为主，兼通藏语，并借用了很多汉族的习俗及信仰，如信奉道教文昌神灵，过春节、端午等汉族节日。这是从西宁至塔尔寺，经过拉脊山到群加的藏汉文化互动、融合的“倒塔型”涵化带，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族籍认同上，宗教具有重要作用。这里存在一个由塔尔寺、西纳寺、村庄寺庙（或山神庙）这些宗教祭祀场所组成的佛、苯杂糅的信仰体系^①，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对其虔信有加，认真实践着系统复杂的传统宗教礼仪。显然，家西番人之所以坚守自己的民族边界，与塔尔寺直接相关。塔尔寺及其所属寺院体系的存在，使家西番藏人族群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融而不化，仍然保持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点。

（四）卡力岗模式^②：藏回的伊斯兰化

卡力岗，系藏语“高山”“雪山”之音译。卡力岗地区系指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德恒隆乡、阿什乡、沙边堡乡等地。课题组成员在德恒隆乡的德一村、德二村、支乎具村进行了调查。

形象地说，卡力岗地方的藏回是一个着藏服说藏话、到清真寺做

① 在塔尔寺所属的六个藏族社区中，实施宗教祭拜活动仪式的处所一般分四类：每家都有的佛堂；每村都有的小庙“嘛呢康”；每乡都有的寺院；六部落的母寺即塔尔寺。在这四个场所举行的宗教活动以藏传佛教为主，夹有很多苯教或曰民间信仰的要素。简言之，佛教管出世间事，例如来世、成佛等，苯教或曰民间信仰管世间事。例如占卜吉凶祸福，主持丧葬仪式等。

② 该个案为课题组成员化隆籍人氏、青海省委党校桑才让教授所做。

礼拜的群体。他们兼有藏族、回族两种文化的因素，而从族群取向和文化行为取向上看，对藏族文化的认同则日渐淡出，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一种“去藏化”的现象，对于回族文化的认同在强化。

1. 族源辨析

卡力岗地方藏回的来源有两种说法。

(1) 藏族说。据口传史，1756年，甘肃临夏的阿訇马来迟来青海化隆卡力岗地区传播伊斯兰教，遂使一部分藏族群众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并逐渐涵化为回族。目前，他们在族籍上认同回族，在信仰上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语言上仍使用藏语，并保持了藏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人们称这些回族为藏回。

(2) 回族说。在访问中我们发现，卡力岗的藏族和“藏回”中的一部分人坚决否认卡力岗“藏回”全部是由藏族演变而来的说法，认为“藏回”的祖先本来就是回族。他们说，这里的原住民是藏族，回族迁入后吸收了藏文化，后来，这里的藏族又外迁了。

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看，以上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藏族说即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有故事和传说的支持，并且今天仍有一部分“藏回”群众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藏族。^①据《化隆县志》载：清代初期，这一带佛教戒律一度松弛，佛教上层势力给藏族人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许多人由于不堪重负而纷纷外迁。正在此时，花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阿訇来这里传播伊斯兰教。比之藏传佛教的注重来世而淡视现世，伊斯兰的教理教规对于现世的种种阐释和规范实用性强，适合当时这部分藏族群众的需求，这成为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重要原因。

回族说也有历史的可能性。据说，大约四百年以前，在马来迟阿訇讲学之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藏族群众，回族只有五六户，他们是为躲避战乱和灾难从甘肃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临洮、青海民和等地迁来的。后来，他们逐渐受到当地藏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使用藏语交

^① “我们的祖先是藏族，马来迟传教后这里的藏族慢慢信仰了伊斯兰教”（被访德一村村民，60岁，男性）；“我们的祖先是藏族，后来随了回族”（被访德二村村民，47岁，男性）。